

国民政府收容日俘之写真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评介

曾景忠

孙金科同志长期从事中日战争中，日本人的反战运动和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俘收容教育情况的研究。孙金科除从国内图书馆查阅资料外，曾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搜集资料。他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资料》一书（共有13卷，4900页）中获得了许多有用的材料。孙金科直接查阅采访过在日本的原日俘收容所日俘的记录。

最近，他与陈海宁、杨定法合作，又出版了一部新著——《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香港天马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此书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日俘收容所的设置、变迁和对日俘的管理教育工作，与收容所内日俘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反战运动工作的开展等，作了平实、真切的记述。它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填补了中国收容管理日本战俘研究领域的空白。

正如当年从事日俘管理教育工作的康大川先生所言：在中国的日俘收容所中，日俘“得到了人道主义的待遇”，“与侵华日军对关押在其集中营的中国军民，实行虐待、残杀，用作掘煤劳工，当作细菌战的试验品等暴虐行为，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一书，围绕日俘收容所内管教人员、日俘和日本反战运动人士鹿地亘与日俘的交流等几个方面人物活动的记载，揭示了中国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俘工作的进展及其效果。

阅读孙金科的这本著作，我们对抗战时期日俘收容所的情况有了大体的了解。

日俘收容所的变迁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对日俘的教育转化工作，列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蒋介石曾下令，强调要对日军俘虏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军令部）设立了日俘收容所，随着战局的变化，前后经过了几次变迁。

1937年底，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将俘虏的日本兵集中到武汉，设立分属于军令部和航空委员会的两个临时俘虏收容所。1938年7月，武汉撤退前，军政部分别在陕西西安和湖南常德设立第一、第二俘虏收容所。

1939年秋，随着西安行营西迁甘肃天水（成为天水行营），设于西安灵感寺的第一日俘收容所西迁宝鸡太寅寺。1941年初，它从由天水行营管辖，改归天水行营西安办公厅管辖。

武汉失守后，常德第二日俘收容所，于1938年11月8日迁往贵州镇远。1939年5月，桂林行营在桂林设立临时日俘收容所。不久，军政部又在重庆设立了第二日俘收容所的重庆分所。1941年9月6日，重庆分所和桂林收容所的日俘，也转移到镇远。1944年12月初，湘桂战场中国军队败退，日军攻入贵州。镇远第二日俘收容所北移，至12月18日到达重庆南之巴县鹿角乡。此后即称鹿角战俘营。

太平洋战场爆发后，随着滇缅战场的开辟，国民政府在昆明也设立过临时日俘收容所。1945年湘西会战中，中国军队俘虏了许多日本士兵，在安江（今黔阳）临时设立过日俘收容所。后来，这部分日俘都转移到重庆巴县。

孙金科书中在全面介绍日俘收容所的过程中，着重记述了第二日俘收容所在常德、镇远、重庆三个阶段的情况。

日俘的不同思想表现

尽管在日俘收容所中，中国管教人员对被俘的日本士兵施以人道主义待遇，进行教育感化，但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毒质的薰染，日俘的思想转化非常艰难，经过教育后，思想转变者和顽固不化者有明显的分野。《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一书中提供了许多实例，描述了这方面的情况。

在日俘中，台湾籍和朝鲜籍者变化较快。因为台湾本属中国领土，甲午战争后才割让于日本的。台籍士兵被迫入伍参战，被俘后，日俘收容所经报行营同意，不将他们当日本战俘看待。如有名林一鹏的台籍俘虏，收容所迅速解除了他的日俘身份，并聘他担任音乐教员。他甚为感激，积极工作，教所内人员唱抗战反战歌曲。（第5页）

朝鲜被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朝鲜人心怀亡国之痛，他们也是被迫征召入伍，开到中国来作战的。到战俘营后，一些日本战俘仍以其“优秀民族”自居，卑视朝鲜人。他们甚至认为，把他们与朝鲜人关在一起，“简直是把人和猪狗等同起来”。（第22页）而朝鲜籍俘虏开始公开控诉日本人继续压迫、欺凌他们的种种劣迹。（第15页）朝鲜籍俘虏表示：“我们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他们在俘虏营高唱“朝鲜民族独立”歌。（第125页）日俘营中还有一些被日军征作慰安妇的朝鲜籍妇女，她们的命运极为悲惨。

日本籍战俘的情况相当复杂，总体而言，日本是优秀民族，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有理等思想根深蒂固。一个日本战俘当面对反战运动人士鹿地亘说：“讲平等，就没有办法维持秩序。战争就是为了秩序。有战争才有日本的延伸。只有战争才能消除日本的腐败，消除其他民族的腐败，从而维持秩序，维持日本优等民族的本性。”（第22页）

有些日俘经过教育，思想有重大转变。川本邦男原来以为到中国打仗是正义战争，为了东亚和平。后来认识到：以侵略暂时得到和平，那决不是真正的和平。应尽快从中国领土撤兵，停止中日两国间的战争。我们过去完全错了。现在是促使国民觉醒的时候了。（60—61页）长谷川敏三受到教育后，成为镇远日俘班的领导人。1946年日俘被遣送回国时办理遣返手续，受遣送的日俘队伍，被称为“长谷川独立部队”。（88—89页）

顽固的日本战俘，对听从管理的日俘施压，背地里挑拨战俘与战俘收容所管理者之间的关系。（61页）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到战俘所视察时，他们煽动其他战俘对鹿地跟踪监视，骂鹿地为“卖国贼”。收容所的中国管理者，不得不派人暗中保护鹿地。顽固分子大哭大喊，烧收容所内的病室。（78页）他们还反对收容所内演反战剧。日本战俘中最坏的还秘密成立组织“修养会”，表示他们忠于日本军国主义，准备回国后领取勋章，甚至嚣张到要在俘虏收容所内挂日本国旗，并以绝食相威胁。（86页）他们还煽动战俘们逃跑，组织暴动。当告知美军轰炸东京、在冲绳登陆以及日本投降等消息后，顽固派战俘竟然不相信，表示坚信日本是不可战胜的。（117、125页）

日本士兵忠于天皇的意识极为浓烈。在武汉，已经投降后的日本军官接待被遣送回国的日俘时，还批评他们说：日本军人是宁死不屈的，你们当了战俘，替中国人说话，你们是不是对得起天皇？（119页）

日本士兵中也有主动反战者，日本法西斯对他们拼命镇压。有三个日本战俘，竟是被日军剪掉

舌头者(第24页),显然是害怕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收容所中有日军的逃兵,主动投降中国军队的。汐见洋(坂本秀夫)出于反战、人道主义思想主动从日军中逃跑,受到中国军队的接待。他在第三战区撰写过抗日宣传材料,决心与反战力量汇合,与中国人民一起,消灭共同的敌人。(59页)

日俘收容所的人道主义管理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一书,对日俘收容所中的管理人员也作了叙述和介绍,对他们从事日俘管理教育工作中,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作了具体描绘。

日俘管教人员汪大捷、孙必亨、姚开白、刘裕胜、刘长裕、邹任之、廖体仁、刘舜生、康天顺、莫锦龙等,他们中有许多人留学过日本,对日本人的性格风俗有较多的了解。他们对日本战俘,在生活保障、卫生、医疗、劳动、学习、管理教育方面都尽心尽力做好。特别是针对日本人的强烈民族感情,尽量进行感化。

为减轻日俘的敌对情绪,开始时,常德第二日俘收容所称为“和平村”,称俘虏为村民,起用日俘为俘虏干部,协助所的管理工作。桂林日俘收容所取名“苏生学园”(取苏醒新生之意)。就这样,有的顽固日俘还反对“苏生乐园”的名称,说:“我们是俘虏,没有犯罪,不需要苏生。”(54页)汪大捷教授提出,要把日俘收容所办成教育日俘的学校。他按照孔子的大同思想,取名第一日俘收容所为“大同学园”。他教育所内管理人员,要以“以德报怨”的态度对待日俘。他们教日俘中国话,教育他们反对侵略战争,争取中日和平友好。(第4页)收容所组织战俘们开展体育、文化活动。

第二日俘收容所重庆分所1939年建立时,取名为“博爱村”。门口写有标语:“欢迎日本兄弟!”“日本人民是我们的朋友!”邹任之组织博爱村自治会。(67页)

邹任之任第二日俘收容所所长时,组织对日俘进行精神教育,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医疗等。甚至有的日俘病死后,邹还令为死者刻墓碑。(30页)莫锦龙、康天顺改善收容所的卫生条件,组织日俘开展生产劳动,改善伙食,组织合作社,制作家具和工艺品,还对日俘进行宗教教育,进行基督教洗礼。(84—85页)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的生活极其艰难,但对日俘的生活和医疗尽可能予以保障。人们难以想象,在中国紧张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里,在日本野蛮残酷地屠杀中国军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给予日本战俘这样人道主义待遇。

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的耐心教育

在对日俘进行管理教育的工作中,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鹿地亘到日俘收容所视察,了解日俘的思想,对他们进行教育。日本战俘民族观念极强,他们对中国人不信任,但对日本本国的人能讲心里话。《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一书中对鹿地亘到日俘收容所的活动有较多的介绍。

鹿地亘本是日本作家,曾从事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中日战争爆发后,他滞留在中国。他是有名的反战运动人士,参加中国的抗战阵营。他被聘为军委会政治部少将设计委员。19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将士徐焕升、佟彦博等曾驾机远征,20日凌晨,飞临日本上空,对日本实施过一次“纸弹轰炸”。对日宣传的传单,就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与鹿地亘商议后撰写的。

鹿地亘多次深入日俘收容所,向日俘作报告,与日俘个别谈心。日本战俘出于本能的民族心理,对中国管理人员心存戒心,但对本国同胞敞开思想,提出看法和问题。

不过,日俘们开始对鹿地亘也有排斥情绪。据一个名叫伊藤和夫的战俘说:这里的日本战俘都不愿意见到反战运动人士鹿地亘,认为鹿地亘“贪生怕死”,是“靠敌国(指中国)——中国帮忙搞革

命”。(第 25页)经过耐心地交谈,日俘们的思想态度才有所转变。

鹿地亘从日本国内政治的角度,分析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祸因。他指出,战争的责任完全不在日本国民,军国主义分子对国民做了欺骗宣传,对反对战争者进行暴力镇压。国民被阴谋家自由操纵,任由他们宰割。野心家独揽政治大权,拖着国民的鼻子团团转。(28—29页)鹿地心平气和的讲述,逐步改变了日俘们的态度,提高了他们的认识和觉悟。

鹿地亘还在日俘中从事反战同盟、民族解放同盟的组织工作。

反战运动的开展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一书对在日俘收容所中开展反战运动的情况也有不少记载。

日俘收容所在进行反战教育的基础上,发动觉悟了的日俘开展反战运动。1939年7月7日,第一日俘收容所,即大同学园,成立反侵略战争同盟会和反战剧团。这个反战剧团还到西安的剧场演出,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同盟会创办了《大同报》学员们写的文章起到自我教育的作用。

鹿地亘在桂林、镇远、重庆等地都积极主张,组织日俘开展反战活动。1939年4月,鹿地亘拟订的建立日人反战同盟计划,通过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批准了这一计划。桂林行营政治部负责筹建。(52—53页)林则徐之孙林长鏞担任了反战同盟的顾问。桂林的《微亡日报》对鹿地亘领导的反战同盟组织进行了报道。反战同盟的工作偏重于宣传,使中国人民了解日本人民和他们的革命,使日本人民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抗战。(62页)反战同盟创作了“反战同盟歌”。鹿地亘还为反战同盟工作队创作了队歌。这就是“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创建。遵照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的指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于1941年9月6日迁往镇远。

重庆日俘收容分所组织朝鲜籍俘虏组织朝鲜义勇队,发展日俘参加反战同盟。(63—65页)1939年8月5日,在这里举行了朝鲜人“解放”仪式,组成“朝鲜义勇军”。(71—72页)

日俘重庆分所组织反战同盟准备会,于1939年编印了《和平战士》刊物,对外宣传。(71页)1940年3月30日,日本人反战同盟重庆总部成立,编印《为真理斗争》刊物。7月20日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加入重庆总部。9月,反战同盟总部派出12人组成工作队去宜昌前线进行反战宣传。9月24日—1941年1月30日,他们在前线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75—76页)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阳翰笙和冯乃超对日人反战同盟工作都做过指点。

日俘收容所还开展日本情况的研究,从日俘中调查日本国内的各种情况并撰写材料,或开座谈会,整理成材料,供军委会编的《敌情研究》和鹿地研究室编的《鹿地研究报》选刊。1942年—1944年两年半时间中,从镇远送到重庆的日俘所写的各种宣传资料共有150多种。(89—90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驻华大使馆曾与国民政府联系,拟组织日人反战同盟赴新加坡参加前线反战宣传工作,后因新加坡失陷而未成。(80—81页)军委会政治部曾聘鹿地亘为中国远征军驻重庆顾问。美国也聘鹿地为日文版《日本新闻》的顾问。(94页)美国情报机构还拟请鹿地亘协助做宣传工作,后未有结果。(113页)

1944年3月,鹿地研究室拟订了《日本民族解放同盟纲领草案》,旨在团结在中国大后方和世界各地,包括日本国内的日本人,为争取日本早日停止侵略战争,建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而奋斗。(98—99页)这一纲领交给日俘们学习讨论,后来出版了《和平先锋》(后改为《东亚先锋》)。

白描特写式的叙述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写到,日本战俘收容所存续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于1946年3月18日结束,鹿角乡收容所的日俘离开重庆,经上海回国。日俘归国后,怀念在中国收容所的生活

经历。一些日俘后来来到中国探视收容所的遗迹，挖掘死亡的日俘遗骸运回日本。他们怀念在中国生活过的地方，长谷川敏三称那里是他的“第二故乡”。

该书除叙述战时日俘收容所的情况外，还附带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抚顺日本战犯管理所管理日本战犯的情况。

人们对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俘虏的日本士兵情况了解甚少。《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作者想方设法搜集资料，勾勒了中国日俘收容所的概貌，读者从中得知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一书，运用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包括许多日本战俘的日记，鹿地亘的著作，以及一些当事者的回忆和报刊资料，对日俘收容所的情况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记载。叙述方式，是白描式的，尽量保留原始资料叙述的原貌，原汁原味，给人真切感。

该书对日俘收容所中的管理人员和日本战俘，进行真人真事的描述，每一章中多数节目，都是一节叙述一个人物的故事，如同特写镜头的写真，更显得生动具体。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一书的写作也有缺点，主要是书中所据资料的出处未能加注注出。书中各章节间有些内容是相互关联的，在叙述中衔接交待不够清晰。如果将来修改，希望作者能进一步丰富内容，并融会提高，提升学术水平。

(作者曾景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责任编辑：李仲明)